

汴

著

血色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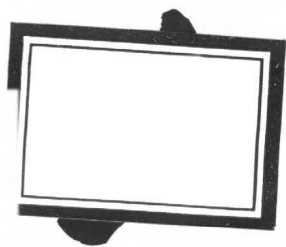


復旦大學出版社

冀

沅

著



色流年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色流年/冀汭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7
ISBN 7-309-04018-X

I. 血… II. 冀… III.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2093 号

血色流年
冀 汭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孙 晶

装帧设计 孙 曙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0 插页 5

字 数 276 千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9-04018-X/I · 255

定 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自己对自己最熟悉么？倘若随便问问，自己也会漫应道：当然咯！如果追问一句：请把你襁褓时期的情形讲给我听听，恐怕只能哑口无言了。这个问题，父亲也回答不出；唯一有发言权的只有母亲。人，对自己的婴孩时期一无所知是毫不足怪的；三岁至六岁的事情或许可以记得起一些当时特别感兴趣、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但发生这些事情的地点和时间却又往往模模糊糊，难以确定；从感觉上仔细琢磨，从记忆里认真搜索，也只能“大概或者也许是，我想恐怕未见得”了。

我所知道的我自己，襁褓时期的情况多数是六七岁以后听祖母当故事讲的：你很瘦，安娘（我的母亲）奶水不足，把你喂得皮包骨，像孙猴子，还常常生病……我会嬉皮笑脸地凑上一句：这孩子养不活的啦！祖母便笑着骂道：欠掌你的嘴！自从那个真正“养不活”的弟弟振生出世之后，父母便把我交给祖父、祖母带领了。振生死后，母亲又连续生育了云生、棋生、明生和一位直到她过了五十岁才有机会和我见第一面的妹妹……我是由祖父、祖母带大的。再多的情形，我就知道了。偶尔也会在记忆里冒出一些有趣的细节，但它们毕竟没有连续性，也弄不清来龙去脉，显得朦朦胧胧，似有若无，而且得不到证实，无从断定它们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还是听到的传说，还是出于自己的想象，或者简直就是梦境。

写我自己，理应“话说从头”。但一无资料，二无可供咨询的人；尚健在的同龄人对于我，谁也不会比我自已知道得更多一些。考虑再三，实在无法从头说起。我不具备报告文学作家善于给名人编造

传记或传奇的本领,何况自己并非名人,用不着花冤枉功夫根据家谱世系考证出自己或自己的某个拐弯抹角的亲戚的亲戚是尧、舜、禹、汤,或文、武、周公之后裔,把鬼话当作光环,套在头上,招摇撞骗,还是实话实说,从自己知道的时候写起,写自己确实知道的事情。不过还得补充一个“但书”:有些时间是准确的,有些则要打问号、打折扣了,因为那是毛估估的或者事后推导出来的。我的时间观念特差,对数字的记忆力也极不得劲。可以保证的是,我是诚实地一字一句地写下去。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写。这样做,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1998、1999年两次中风之后,已不良于行。图书馆虽然离我家很近,走一趟也很艰难。我不敢挤公共汽车。若每次打车来回,根据“量入为出”的消费准则也不是我能够承受的,何况这个图书馆也没有我需要的资料,必须到孤山藏书楼去找,那要拾级而上,攀登一道高坡,没有人陪着,哪敢作这种尝试?何况每次都需要有单位介绍信并经过谁批准,才可见到虽然不算古籍、善本却也保藏了半个世纪的报刊。于是干脆不外出找任何资料了。除手边已有的资料,主要凭记忆写,如果因为记忆错误而写错,我承担全部责任。

目 录

我与故乡	3
逃亡,流浪	25
小学时代	35
“无业游民”	43
大学生活	52
上海半年	77
从南京到杭州	93
迎接解放	100
1955 年,开始是这样的	115
隔离反省	123
关进监狱	136
易地监禁	154
1956 年,台风前后	162
不平凡的 1957 年	169
“大跃进”的 1958 年	180
“免于起诉”,释放	190
“内部控制使用”	205
调换劳改单位:奉命创作电影剧本	22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228
从接受场员监督到关进“牛棚”	232
“造反派”掌权	237
生产建设兵团又变成了劳改农场	253
被省文联“借用”	261

提前归队与滞后平反	266
不算“运动”的“运动”	270
尾声	274
 附录	 283
也算“两地书”	285
文学新貌“一瞥”	302

最熟悉我的坎坷的是我
最不能掌握我的“命运”的也是我
最了解我的隐私的是我
最不明白我的缺点的也是我
最忠实于我的朋友是我
最不肯和我妥协的对手也是我
我是我的矛
我也是我的盾
我的矛可以刺穿我的盾
我的盾也可以挫断我的矛
我活着永远只能是我自己
我死了也决不会忽然变成别人

——引旧作《我》



我与故乡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故乡的怀抱里度过的。记不清六岁还是七岁的时候,祖父、祖母刚过六十大寿,就怀着“落叶归根”的游子心情,带着我从荷兰殖民地爪哇岛的首府巴达维亚(Batavia,即荷兰殖民者占领爪哇的刽子手名字,今雅加达)回到了唐山(当地华人都习惯地这样称呼中国)。哪一年呢?我无法确切指明,因为当时就没有记住,现在也无人可供咨询;登陆的地点是上海外滩,街头指挥交通的都是头上缠着红布或者黄布的印度巡捕,那时应该还叫做“英租界”吧?走在街上的中国军官都拖着一把东洋指挥刀;那当然是军阀孙传芳或者别的什么人统治着上海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的时代。什么季节呢?我也说不清楚,回乡的路上,只见农民们正在收割蚕豆,而且天气也不太热,自然是春末夏初了。至于乡下的“老家”,在爪哇的时候,祖父、祖母就千百遍地告诉过我,所以至今还牢牢记得它的全称:湖北省天门县东乡七十二垸二十一都河湾垸莲池寺村。为什么村名莲池寺?则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是一个只有三十多户居民的自然村,居民全姓陈,是一对夫妇繁衍出来的后裔,人际关系都按辈分称呼。村里有两座公共建筑,一座是“陈氏支祠”(“宗祠”建在距此15里的松石湖陈家西湾,表明两处陈姓居民是有血缘关系的),另一座就是“莲池寺”。寺庙算附近的蒋村、郑村、袁村和张村的公共建筑。庙宇建在陈家村头,菩萨当然要优先保佑姓陈的,所以就村名叫成“莲池寺”。听老人说,它原先是一座大庙,有三座大殿,失火烧掉了两座,只剩最后一座了,但仍然称为“大雄宝殿”,塑着佛祖金像,四大金刚像,财神爷赵公明像。佛祖金像前面,还摆着一

块贴金的木牌，黑漆楷书写着：“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早就是“中华民国”十几年了，爱新觉罗氏还君临着这个村庄。村民们谁都没有意见，只有祖父摇过头，因为在爪哇我家就挂着红黄蓝白黑的“中华民国”国旗。在这一点上，祖父似乎比所有的村民都高明一些。烧毁的大殿并没有重建，火场便变成了全村的晒场，收获季节曝晒粮食，这大概就是菩萨对村民最实惠的“保佑”了。平时，每当夕阳西下，这里便是儿童游乐场。我回乡不久，也成了一个百分之百的农村孩子，跟同龄人玩在一起，赶羊、抛皮球、踢毽子、翻筋斗、倒立、老鹰抓小鸡。有时候，也在空地前的小河里学游泳、戏水、打漂漂儿。一天，放鸭子的人撑着一只小船赶着一群鸭子游过了河面，我和一群孩子接着下水嬉戏，上岸后，全身便发出了丘疹（荨麻疹），奇痒难耐，抓破了皮也不管用。祖母说，这叫“风湿疙瘩”。农村缺医少药，她只好“土法上马”，在我身上抹烧酒，用生姜片搽抹那“风湿疙瘩”，但也无用，整整折腾了一宿，才完全平复。我从此就不敢下水了，所以直到今天也不会游泳，旱鸭子一只。

儿童的时间感跟成人不同，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老是问祖父：“怎么还不过年呀？”他的回答总是“快了，快了”。我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殷切盼望的“年节”到来之前，还要遭受严酷的冬天的煎熬。一个从赤道岛屿回到江汉平原的孩子，头一回看见“大雪纷飞”的景象，那喜悦之情决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孩子们所能体会的。我觉得，那景象太神奇了，就像漫天飞舞着轻飘飘的凉凉的绵白糖。我张开嘴巴迎接它们，我拉起棉袍的下摆去兜着它们。当积雪盈尺的时候，我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在禾场上堆雪人，把积雪捏成一个个雪蛋，互相抛掷着，打雪仗。几次快乐的游戏却给我带来了一个季节的痛苦。我的耳朵、脸庞、双手、双脚都生了冻疮，而且溃烂了。无医少药的乡下，只能用老办法治疗：在患处涂抹狗油，然而无用。到了“年节”，虽然有丰盛的菜肴、汤团、年糕、麻糖、京枣之类的茶点、糕饼，还有长辈们给的压岁钱，还可以放鞭炮，我却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快乐。

过了几个“年节”，我现在也无法说清楚，只记得那个年节刚过，祖父就对我说，“到了‘启蒙’的年纪，要送你上学堂了。”“学堂”就是私塾，设在“陈氏支祠”里。塾师名叫陈宗仁，是科举制度废除之前最后一次考试的落第“童生”，按辈分，该算曾祖辈，才四十多岁，已经蓄起了胡子。在村里，他是唯一的一年四季衣着整齐的人。学堂，也是附近村庄唯一的学堂。张村、郑村、袁村的孩子们都在这里上学。这天，祖父、祖母给我穿上崭新的长袍马褂，戴上瓜皮帽，把我打扮得像个小大人；然后由祖父带着香纸蜡烛领着我来到学堂，燃烛上香，举行隆重的仪式，一拜“圣人”，二拜先生。全体同学都严肃地看着我一个人表演。后来我才知道，那块叫做“圣人”的木牌写的字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表演”结束后，先生便发给我一本启蒙读物《三字经》，开始教我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还发给我一张他自己用朱笔写的“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初学生，陈性忠，用心习字上呈”。“陈性忠”是先生给我取的学名：“陈”是姓氏，“性”是世代相传排下的辈分，先生只取了一个“忠”字，教我用墨笔“描红”，学习写字。凡此种种，都是仪式，都是“表演”，表示从此刻开始，我算个真正的学生了。

一天，邻居美英婶婶到学堂来告诉我：你爸爸、妈妈回来了。不知怎的，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仿佛还能听到那声音。“还不赶快回去！”塾师提醒我。我立刻飞也似的冲出祠堂门，向家里跑去，我是冲着妈妈跑的；至于父亲，倒不觉得必须见面不可，因为他总是十分严厉，叫我害怕。

家里早挤满了看热闹的邻居们。我全没留意，只见妈妈一个人端坐在堂屋中间，便奔了过去。母亲搂着我，亲吻我。此刻才发现，人们的眼睛都集中在我身上，我害羞地垂下了头。母亲还是不断地亲吻我，泪水都滴在我的脸上了。在场的人发出了快乐的笑声。我都这么大了，还让妈妈搂着，像话吗？我挣扎着，脱出母亲的怀抱，朝禾场上逃。禾场外面的小树林里，拴着几匹卸了载的枣红马，赶脚的人正在给它们喂饲料。村里没人家养马，只有耕田的牛、拉磨的驴，

这些马，自然是爸爸雇来驮人、驮运行李的。我看稀奇似的走近马匹，这才忘却了刚才被妈妈搂着的尴尬。

父亲回国之后办的头一桩大事就是大宴宾客。雇了一位附近颇有名气的厨师掌勺，不仅宴请莲池寺村的全体族人，还陆续宴请了桥头村的有名望的长辈、西湾村的与我家血缘关系较近的（五服之内）老少爷们，祖母娘家史家岭的亲戚们。父亲少小离家壮年回，出去的时候是一个打三棒鼓的小要饭的，于今挈妇将雏（他带回来两个弟弟，一个是棋生，另一个是还在哺乳期的明生。我们兄妹六人，棋生上面的两个弟弟，在我回国前就夭折了，后来明生也夭折了，只有我、三弟棋生和六妹润枝活下来了）回故里省亲，大概也有衣锦荣归之感吧！经过这么一番折腾，父亲也就名声在外了。那时候，附近的几个集镇都成立了“保境安民”的“保安队”或“自卫队”，经常“清乡”，再没有听说发生过土匪绑票案。所谓“清乡”，就是一个班或一个排，荷枪实弹，以集镇为圆心，十里左右为半径，到各个村庄走一趟。在这种貌似“太平”的情况下，“保安队”、“自卫队”就顶替土匪干起了绑票勾当。

我平常放学回家吃午饭，总是全家人都在，饭菜已经摆好，这天却只见母亲一个人坐在门口挑拣混在米里的稗子，沙子，而且脸色阴沉。灶台也没点火。小弟弟明生在房里嚎哭，她也不管。一问，才知道父亲被清乡的逮走了。祖父、祖母赶到那个“保安队”队部所在地灌溉坑去找熟人说情，赎回父亲。我不记得这天妈妈带着我和小弟弟是怎样熬过来的，只记得棋生回来得很迟。原来他跟着比他稍大的一群孩子追着“保安队”到灌溉坑看热闹，又跟着他们回来的。因为被“保安队”逮走的并不止父亲一个人，还有附近几个村庄的村民一共十多名。祖父、祖母和父亲直到深夜才回来。此刻，妈妈叹了一口气，沉甸甸地压在她心头的石块才落了地。

过了许多日子，我才知道是这么一个故事：当地一群游手好闲的痞子，曾利用农村欢庆丰收搭台唱戏的机会多次怂恿父亲参加他们

的吃喝玩乐,主要节目是赌博,都被父亲拒绝了。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想掏父亲的钱袋。虽然父亲偶尔也打打麻将,但只限于他的朋友——几个从南洋回国省亲的华侨,不肯同地痞们打交道。他们怀恨在心,便勾结镇上的“保安队”伺机敲竹杠。出事的这一天,父亲在小河对岸的一家茶馆兼酒馆的小店和几个朋友闲聊,怀里还抱着小弟弟。小店里也确实有两桌打麻将的在赌钱。“保安队”忽然像从天上掉下、从地底钻出来的来“抓赌”。父亲为自己辩解,抱着孩子,想赌也无法赌。“保安队”蛮不讲理,从父亲怀里夺过小弟弟,朝桌上一放,便把他和打麻将的人一起逮走了。但是,打麻将的人半路被搜身之后都释放了,唯独将父亲带到了灌溉垵队部。祖父请镇上的头面人物出面说情。父亲被迫承认打麻将赌博,愿交一笔“罚金”才释放。当然他也被搜身了,现金、戒指、带金链条的金怀表都成了他们“清乡”的战利品。究竟交了多少“罚金”,我不知道,祖母为此唉声叹气时,祖父总是这样安慰她:“蚀财免灾啊!”

这次事件之后,父亲很少离开家门。农村生活是单调的,枯燥的。他带回来一架留声机,但只有几张京剧唱片,早就听腻了。实在闷得慌,就约几位一同从南洋回来的华侨朋友到十里外的干驿镇玩几天。他的朋友中,我只记得有一个叫做黄春生的人,写得一笔好字(那时尚不知道字的好坏,只是听祖父这样说)。他的父亲黄泽鸿也是祖父的朋友,因而两家来往较多。黄春生丧偶,很想干驿镇娶一位续弦夫人,带出国外,所以长期住在镇上。父亲去了,无非是和那群朋友吃吃喝喝,打打麻将。说不定那时候就认识了晴滩酒家的女老板周姑。这是一家夫妻店,她掌勺。酒家生意兴隆,除了菜肴可口,还因为她颇具几分姿色。

冬天来了。母亲生长在爪哇,霜、雪、寒风,对她都是陌生事物。草枯了,树叶落了,只有几丛冬青和竹林例外,依然绿得像涂过油彩。母亲常常望着它们发愣。她虽然穿上了当时款式最时髦的皮袄,穿上了祖母为她特制的棉靴,戴上她自己编织的毛线帽子,还是冻得瑟瑟缩缩,两脚和双手生了冻疮,溃烂了。她开始怨天怨地。我们的住

房是曾祖父留下的遗产,虽然也算三开间,但比邻居的房子都要低矮。用木材当燃料烧饭,经过几十年的烟熏火燎,从椽子、横梁到立柱都熏成了炭黑色,显得陈旧而寒碜。为了御寒,还在堂屋正中烧起一堆火。木柴潮湿,很难烧着,一天到晚冒烟,熏得每个人泪眼汪汪。母亲闹着要回南洋,赌咒发誓不再来中国。过完春节,他们留下三弟棋生,带着最小的弟弟明生启程了。这是我和祖父、祖母、父亲、母亲、棋生、明生唯一一次的全家团圆过春节。这年秋天,祖母去世,父亲也没回家奔丧。

春节后,学堂开学,棋生也进学堂“启蒙”了。

塾师虽然是孔孟之徒,但并不冬烘。那时,正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农村经历过一场农民协会运动、蒋介石叛变、许多人头落地之后,他的案头也有几本新书,和一大摞《康熙字典》并排摆着。祖父常到学堂里与他聊天。我才知道那些书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这表明他还有一点“新”思想。他除了教我念《三字经》,也教我读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审定的《国文》课本,有几篇极富诗意的课文,至今还能背诵,如:“月季花,朵朵红;姊呼弟弟,快来看花。”“雨止。天霁。浮云散。落日红。霞光满天。蝉鸣树间。”另外还有一些杂拌儿,如《平民教科书》、《常识读本》、《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千家诗》、《尺牘大全》,等等。他不认识阿拉伯数字,不懂算术;也不教学生打算盘,大约他自己也不会吧!在这里读过几年书的孩子,都只认识一堆方块字,像唱山歌一样的高声喊着“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离开学堂以后,极少有人能够派上用场,很快就回生了,还是半文盲或文盲。不过,对我却颇为特别。一天,他对我说:你已经读了很多书,读得不错,应该“开笔”了。就是说,应该学习“做文章”了。祖父得知消息,特备香烛,到学堂里来举行“开笔典礼”,再次一拜“圣人”,二拜先生。先生便出了一道题目《学而时习之》。面对这道命题,真像狗咬刺猬,不知从何下手(口)。我苦苦思索,一字一字地写,终于写出了几句“之乎者也矣焉哉”,交了卷。先生用朱笔修改后,批了四个字:“斐然成

章”。他毕竟是虔诚的孔孟之徒，不论世道如何变化，主要课程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我从《三字经》开始，读完四书五经，又读《左传》、《战国策》了。从一个“蒙童”读成了大小子。按照祖父的意思，我应该继续在他的学堂里读下去。祖父对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虽然没有考中秀才，却是一个明白人，足以为人师表。因为祖父自己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只会读信、写信、打算盘，喜欢读《聊斋志异》；他的全部历史知识，都是从《封神榜》、《东周列国》、《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和某些戏曲表演中得来的，理所当然地他成了我的第一个历史老师。

1931年，长江、汉江洪水泛滥，汉口被淹。汉江北大堤决口，故乡也沉入水底，仿佛回到了洪荒时代的云梦泽。家里有船的村民移居到船上；有楼的村民拆掉房屋四周的砖墙，听任房柱浸泡在水里，人住在楼上，就像住在水中的阁楼上；没船、没楼的人家，都纷纷“逃荒”了。那时候，祖母已经去世，祖父便带着我和弟弟——避到地势较高的干驿镇。在镇上，他早买好一幢带店面的房子，委托松石湖西湾村一位远房堂弟监工，早已修缮一新，打算用父亲的汇款开店，聘请一位能干的人当账房，负责经营管理，自己坐享其成，当个“工商地主”。这也算是为自己青年时代因天灾人祸、饥寒交迫、到处奔波、以至最后不得不浪迹海外、谋求生存打个“翻身仗”吧！可惜他拨错了算盘珠子，历史不允许他做圆这个梦。

贺龙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走出洪湖根据地，进驻干驿镇。祖父天然地害怕“共产”，大水退出汉口，他便带着我和弟弟避到了这里。这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向守土有责的东北军下达“不抵抗”命令，几天之内，任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的广袤领土，揭开了人类悲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冬天，父亲回国探亲、治病，在汉口见面了。父亲知道祖父一直让我在私塾里读书，非常不满。父子俩大吵了一场。祖父认错，同意我上正规学校。根据年龄，我应该上中学，但尚不认识阿拉伯数字，不会加减乘除，怎么行呢？于是请同乡魏长卿先生给我和同龄的堂叔陈本

桦补习算术。

父亲是一个人同几位干驿镇附近的老乡回来的,目的是治病。他患上了肺结核,咳嗽,痰中带血。在南洋的唐人,全都像在中国一样的生活着,热热闹闹地过着每一个中国节日,如端午节划龙船,春节期间送灶神上天言好事,下凡保平安,到寺庙进香,除夕守岁,初一拜年,元宵节吃汤团,还要把寺庙里的菩萨抬上街游行,大放鞭炮。荷兰殖民当局不禁止这类的活动,还派警察维持秩序。生活习俗未变,连治病的医疗观念也未变。唐人间流行着“外科找西医,内科找中医”。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染上了肺结核,俗称“痨病”,当年人们看待这种病就像今天人们看待癌症一样。南洋没有好中医,只好回国求治。当时,汉口的医院只有西医,没有中医,于是只能住在一家干驿镇老乡开的名为“兴发公”的客栈里。父亲一人住一间,祖父和我、弟弟仁另住一间。请来的医生都是挂着“世医”和“儒医”牌子的名医,到客栈来把一次脉,诊金银圆五元。名气小一些的,也要三元、两元。他可不请没有名气的。和父亲同时回国探亲的天门籍南洋客也住在这家客栈里,整天乱哄哄,其实很不适合养病。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大小子,举凡抓药、煎药,就成了我的任务。

夜深更深,仍有人打麻将。谁和了牌,还要表示胜利的大喊一声,或者几个人起哄似的哈哈大笑。我常被这种声音惊醒,但一会又睡着了。一天夜里,我却被街上传来的声音闹醒了:“看号外!号外!看号外!……”好像在边喊边跑;一个人刚跑过去,另一个人又跟了上来,追赶似的。父亲在一板之隔的房里喊我起来去买“号外”。我不懂得这是一种什么东西。祖父没让我去,他自己去买了一张回来。那不过是一张小报纸,但他非常兴奋,一边敲着父亲的房门,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打起来了,上海打起来了!”一会工夫,客栈里的旅客都起来了,争相出门买“号外”,不嫌重复。每个人都像多喝了几杯,差不多是手舞足蹈地高谈阔论着。这就是“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在上海租界的驻军突然向驻守闸北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